

当代外交学研究的全景图

——评《全球化世界中的外交:理论与实践》

樊 超

全球化缩短了国家间的距离,带来了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改变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它使得外交的价值开始凸显,为外交提供了大放异彩的舞台,同时也成为当前对外交改变最大、最迅速的因素。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改变将持续下去。于是,全球化背景下外交的新变化、新趋势,成为外交学研究不可回避的命题。

波林·克尔(Pauline Kerr)和杰弗里·怀斯曼(Geoffrey Wiseman)主编的《全球化世界中的外交:理论与实践》^①回应了全球化如何影响当代外交这一命题。本书的23位作者,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都是当代外交学研究领域的专家。波林·克尔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国亚太外交学院的主任;杰弗里·怀斯曼是南加州大学教授,致力于国际关系与公共外交的研究。他们的著述全面展示了当代外交学研究的最近成果和发展趋势。

全书共分四部分,共18章,第一部分介绍外交的历史演变,主要描述了古代西方外交的源起和演变,以及古代东亚外交的形态及其向近现代外交演进的过程。第二部分探讨当代外交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既从多学科的视角看待外交,又关注外交学研究中基本概念的争论;既从西方流行的社会学理论视角看待外交的社会本质,又探讨传统意义上外交的谈判实质。第三部分详细探讨当代外交的机制、过程和手段。第四部分分别从国家、地区和国际层次介绍了当代外交实践和外交形式的发展,这其中包括美国和中国的外交;欧洲、亚洲、非洲、南美洲等区域内的国际组织的外交,以及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组织的外交。

* 樊超: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讲师。(邮编:100037)

^① Pauline Kerr and Geoffrey Wiseman, eds., *Diplomacy in a Globalizing World: Theories and Practic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本书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在保持了最流行、最宽泛的研究体例基础上,以新的成果重新审视、讨论这些传统的命题。通过引入其他领域的理论和视角,扩展了对外交的传统理解和定义,极大地拓展了外交学研究的思路。二是着力探讨全球化给外交带来的新变化,这些新颖的命题也将成为外交学研究的重要增长点。本书主要有以下三大亮点,即在结构上的立体感和全面性;视角新颖,关注前沿;内容上,兼容并包,富于启发。

一、视野宽广、涵盖全面

《全球化世界中的外交:理论与实践》一书是目前当代外交学研究领域较为全面的著作,这种全面性具有多重的含义。以往的多数外交学著作习惯集中关注西方的外交实践或理论,本书无论在学者的国籍和学术背景上,还是在研究对象涉猎的地域广度和时间跨度上,都展现了全球视野。这种状况正符合当代外交学的学科特点,因为外交是国家间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国家的多样性、差异性决定了外交的多样性。在全球化的时代,只有全球性的学术视野才能更好地抓住外交的特点和本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本书作者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背景多元

主编波林·克尔供职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外交学院,主要从事亚太外交和当代外交的研究。杰弗里·怀斯曼在美国南加州大学从事国际关系事务和公共外交的研究,作为澳大利亚的前外交官,他曾供职于联合国秘书长行政办公室,负责防扩散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裁军工作,具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其他参与撰写的专家都在外交学或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独具专长。他们来自包括西欧、北欧、东欧、美国、以色列、中国、南非、澳大利亚等在内的13个国家和地区,使得学术观点和研究对象具有地域代表性。

2. 关注新兴国家,突破以欧美为中心的研究习惯

由于近现代外交源于西方的实践和经验,所以西方外交往往成为外交学研究的重点。而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的外交都呈现出活跃的状态,全书正是以宽广的视野关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外交。

约瑟夫·巴托拉(Jozef Batora)与艾伦·哈达克(Alan Hardacre)将以往对欧盟、东盟等有限的几个区域性外交机制的关注,扩展到更广阔的地理范围,介绍了非洲与南美的地区外交机制,探讨了地区整合中的动力与挑战。^①中国外交也是本书关注的焦点之一。本书不但将中国外交纳入研究的序列,而且邀请了中国学

^① Pauline Kerr and Geoffrey Wiseman, eds., *Diplomacy in a Globalizing World*, pp. 316-317.

者加盟。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赵穗生梳理了东亚地区外交的演进过程。近代以来,西方的入侵打破了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秩序,源自西方的近代外交开始进入东亚地区。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之后,东亚地区的外交也开始袭承西方外交的基本特点,只是作为军事的附属而存在,主要为战争之后缔结条约而服务。到了冷战时代,两级对抗的加剧使安全问题成为核心,将东亚地区卷进了集团外交。^①叶自成和张清敏梳理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外交的新发展和新特点,包括中国参与多边外交的课题,中国的全方位外交的形成,中国外交外延的拓展,专业化对外交权力的影响,外交行为体多元化等课题,实际上给出了研究中国当代外交的路线图。^②无论是新兴国家、新兴地区成为当代外交学研究的对象,还是更多国家的学者进入当代外交的研究领域,都说明新兴国家外交的发展将会因为其独特性,进一步丰富当代外交学的研究内容。

3. 追古溯今,拓展时间跨度

本书的研究不仅突破了地域限制,而且利用考古学的新发现,将外交的源起追溯到四千多年前。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雷蒙德·科恩(Raymond Cohen)将外交源起的时间向前推进了上千年,突破了以往仅限于对古希腊和古罗马外交的研究,展示了4500多年前西方古代外交的样貌,让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古今外交鲜明的延续性:无论是贸易外交、文化外交、公共外交,还是非政府行为体、多边结盟,抑或是官僚机构间的争权夺利,早在几千年前就已出现。从外交机构、人员的职能与工作方式,到条约的缔结与保障,都说明外交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横向上的共性,也在时间上具有纵向的共性。^③

二、视角新颖,关注前沿

本书虽然关注的时间跨度很长,但重点仍然是全球化时代的外交,尤其突出了全球化对当代外交实践的影响,以及当代外交的新发展、新趋势和新形式。

首先,本书提出,全球化将相距遥远的地区和大陆联系起来,加强了相互间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改变了外交的环境。一方面,全球化与经济依存提升了经济外交的地位,对国家协调各个外交部门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外交谈判的专业性也提出了新挑战。^④另一方面,公民社会的成熟开始改变政府与社会的力量对比,国家行为日益凸显对社会事务和个人的关注,外交的内涵也随之被拓展。以往主要关注于国家安全的外交谈判,开始服务于促进民众福祉、保护公

① Pauline Kerr and Geoffrey Wiseman, eds., *Diplomacy in a Globalizing World*, pp. 32-41.

② Ibid., pp. 287-298.

③ Ibid., p. 29.

④ Ibid., pp. 223-224.

民安全。^① 非国家行为体在第二轨道外交中的作用开始引起学术界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公共外交成为国家外交争取舆论、动员社会、对外国公民开展公关的重要工具。在这样的背景下,领事外交的传统职能和现实作用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总的来讲,全球化不但改变了外交部机构职能的设置,也冲击了外交部与其他涉外部门的权力关系。^②

其次,信息沟通作为全球化时代最活跃的因素,成为改变当代外交的另一推动力量。通信技术的进步,在缩短外交沟通周期的同时,也开始限制外交官的受权范围和程度;既拓宽了信息搜集的来源,冲击了外交官搜集信息的职能,又改变了外交系统的组织架构原则;不但拓展了国际会议的形式,还使外交系统与公众的单向互动发展为双向的更广泛的互动。^③ 随着社会节奏日趋加快,情报对于外交决策与实践的价值将与日俱增。^④

最后,全球化导致了国际社会权力分配的变化,直接挑战了多边外交的基础和工作效率。^⑤

1. 从全球化视角界定外交概念

外交的定义是外交学研究的起点,决定着外交学研究的对象、内容,甚至是研究方法。全球化在开拓学术视野的同时,也导致了对外交定义理解的多元化,是外交学研究领域出现众多争论的根源。而外交理论显然也受到这种争论的影响。

本书针对全球化背景,提出了对外交概念的新理解。比勒陀利亚大学政治学系研究员、罗格斯大学全球变化与治理中心访问学者杰弗里·艾伦·皮格曼(Geoffrey Allen Pigman)梳理了关于此的争论:对外交定义的争论拓展了人们对当代外交的理解,将更多的外交方式和手段囊括进来,并最终回归到学术界的传统理解,即外交是主权国家处理国家关系的具体行为。^⑥

不同的理论视角对外交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界定,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对外交定义的不同理解,导致了非政府行为体是否属于外交行为体的争论。实证主义倾向于国家间安全关系的视角,所以它眼中的外交,代表的是政府间的官方关系和行为,因而更关注政府行为体的行为;而后实证主义则更愿意从经济和社会文化的视角看待外交,愿意把外交看作是社会关系在国际交往中的拓展,也就更加专注非政府行为体,如国内利益集团、跨国公司等。^⑦ 随着公民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的日益成熟,后实证主义的视角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很多学者也愿意将非政府行为体纳

① Pauline Kerr and Geoffrey Wiseman, eds., *Diplomacy in a Globalizing World*, pp. 109-111.

② Ibid., p. 139.

③ Ibid., p. 173.

④ Ibid., pp. 259-260.

⑤ Ibid., p. 190.

⑥ Ibid., p. 70.

⑦ Ibid., p. 78.

入外交行为体的范畴内。

巴黎政治大学的伯特兰·拜迪(Bertrand Badie)主要研究全球化对国际体系的结构效应,关注非政府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作为后实证主义视角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全球化强化了非政府行为体的角色,它们积极参与国际活动,冲击了政府行为体主导的传统外交,从而形成了“政府间外交”(interstate diplomacy)与“社会间外交”(intersocial diplomacy)并存乃至对峙的局面。^①换言之,他实际上将非政府行为体的国际行为归入到外交的范畴。以这种观点为代表的理论视角,无疑将成为挑战外交传统定义的重要因素。

2. 从全球化视角理解外交理论

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外交学的研究处于弱势的地位,一直很难摆脱从属于国际关系研究的状态,这导致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外交学理论研究的滞后,或者说外交学尚未从自身学科中抽象出相应的理论。在国际问题研究发达的美国,外交学不是独立的学科,甚至被视作“国际关系的一部分”。^②这种学科划分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理论更容易出自国际关系研究,也使外交学的理论化面临相当难度。

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保罗·夏普(Paul Sharp)是外交理论研究领域的专家。^③在本书中,他介绍了两类不同含义的理论:第一类理论被称为“与外交相关的理论”(theories of diplomacy),是广泛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加深对外交的理解,并非从外交学本身抽象出来的理论。第二类则被称作“外交理论”(diplomatic theories),是指外交制度和规范,是由外交官的权利、责任和外交官的行为方式等组成的体系,其代表文件就是《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④从这两类理论的差异来看,中外学者对理论都有着两种不同的划分标准。

夏普教授提出“与外交相关的理论”,其目的在于通过社会学的理论总结外交,实际上使用了学科交叉的方法。从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视角来理解外交学显然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但这通常会从另一个方面给外交学的研究带来困扰。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无论是从现实主义的观点,理性主义的观点,还是从革命主义的观点出发,外交始终都将成为国际关系的一种工具,处于从属地位。而借用社会学的理论,又容易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理解外交关系,从而忽视外交的政治属性,混淆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的本质区别。但无论如何,要加深对外交本质的理解,要从外交学本身提出高度抽象的理论,这种多视角解读的方法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

① Pauline Kerr and Geoffrey Wiseman, eds., *Diplomacy in a Globalizing World*, pp. 96-98.

② 高飞:《我国外交学研究的现状和主要问题》,《国际论坛》2007年第1期,第33页。

③ Paul Sharp, *Diploma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④ Pauline Kerr and Geoffrey Wiseman eds., *Diplomacy in a Globalizing World*, p. 61.

三、研究对象遍及全球,观点富于启发

本书关注全球范围的外交,不再单纯以西方为中心,而是将目光同时转向亚非拉和欧洲地区,中国、美国的外交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占据了醒目的位置。

作为实力超强的大国,无论是从外交技巧的成熟度上,还是从学术研究的繁荣程度上,美国都是无法绕开的研究对象。外交是实施对外政策的工具,有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就有什么样的外交。^① 美国塔夫茨大学外交史和外交学专业的教授艾伦·K. 亨瑞克森(Alan K. Henrikson),正是从外交学的视角重新解读了美国的外交史,用实际案例说明外交与对外政策的区别。在他看来,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外交经历了三个阶段,即遏制(containment)、转型(transformation)和接触(engagement)。遏制政策在美国战后外交史当中占据了绝对的比重,与此相适应,美国在外交上奉行“只在实力基础上谈判”(negotiating only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的原则。^② 转型政策则是为了弥补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生硬的外交政策的缺陷。赖斯就任国务卿之后,改变了单纯用实力压迫对手改变国际行为的方式,而是提倡通过美国的外交行为增进别国民众的福祉,以期从根本上改变一国的国际行为。^③ 这样,美国外交系统的工作就开始“将别国的内政置于本国外交政策的核心。”(putting others' domestic affairs at the center of foreign policy)。^④ 而接触政策作为奥巴马政府倡导的巧实力(smart power)的主要表现,需要最典型的外交谈判业务的介入,即,“说服敌人和朋友”(talking with enemies as well as (just) with friends)。^⑤ 这样的分析清楚地展现了外交与对外政策的区别。

本书关注世界其他地方的外交时,对中国外交倾注了很大的精力。这与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无相关。中国融入世界的趋势是中国外交学研究大发展的机遇,中国外交在几十年间的巨变,对总结中国的外交实践、规范中国的外交制度、凝练中国的外交理论,无疑提供了最丰富的原始素材。

夏普教授借用其他学科理解外交的方法,给外交的发展带来新的启示。这种学科间的互动实际上属于跨学科研究的范畴,尽管这种学科交叉的情况会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媒体语言和大众化语言的扭曲,容易对外交的政治本质产生错误的认识,但对外交学研究而言,学科的这种交叉无疑是一个新的发展路径。

与外交学产生交叉的专业门类往往是比较成熟的应用学科,这些学科的研究

① 鲁毅等:《外交学概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5页。

② Pauline Kerr and Geoffrey Wiseman eds., *Diplomacy in a Globalizing World*, p. 269.

③ Ibid., p. 272.

④ Ibid., p. 270.

⑤ Ibid., p. 274.

方法与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和解释外交学在这些交叉领域的规律。更重要的是,正如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路径那样,学科的交叉极有可能为外交学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借鉴,成为外交学研究大发展的一个契机。

具体来讲,学科交叉对外交业务研究的启发意义不仅体现在归纳作用上,还有助于将外交实践理论化。以本书提到的各种外交业务为例,对外交部和国家外交体系的研究很难忽视其本身的行政特性。正如杨振先在《外交学原理》一书中指出的:“外交学研究的主要范围,系外交机关,并说明此项机关如何进行外交事务”。^① 所以,外交部和国家外交体系在全球化冲击下发生的变化,有可能用行政学的理论做出解读。经济外交自然离不开经济学原理的支撑,随着对经济外交研究的深入和细化,隶属经济学分支的贸易、财政金融、投资等原理都不可避免进入外交学研究的领域。公共外交的兴起,既需要外交行政部门从专业的视角学习、把握与公众互动的技巧,也需要外交学者们从理论视角归纳公共外交的规律与原则,而公共关系学科的理论无疑将为此提供一种研究捷径。随着外交向更多的领域延伸,外交所处理的事务已经不再限于传统的政治安全议题,以往用于政治与安全的谈判技巧,已经难以胜任处理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问题。发源于现代经济学的谈判学,对当代外交谈判技巧的改进,显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对外交学研究而言,现代谈判学所遵循的原则和技巧显然更利于学者们总结当代外交谈判的基本规律和法则。而以往主要依靠谈判处理外交危机的模式,与企业管理学中的危机管理相结合,则孕育出外交危机管理这一新课题。

四、几点不足

这本专著视野宽广、内容充实,具有很高的学理价值,是当今外交学教学研究难得的参考书,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本书涉及面宽广,但深度不够。尽管本书中的每一章都是作者在相关领域长期研究成果基础上提炼出的精华,作者也通过注释的形式列出了相关课题的研究成果,但书中很多问题未能充分展开。

第二,本书忽略了外交学研究中的几个重要方面,如外交得以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交规范,所以外交规范的发展是外交学发展的重要方面。全球化时代,很多传统的外交规范都面临着挑战,一些新规范正在形成,但是本书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第三,本书中,不同学术背景的作者对同一个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书中多数作者都立足于探讨外交,如亨瑞克森尽管涉及外交手段向对外政策的演化,但仍很

^① 杨振先:《外交学原理》,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第 8 页。

好把握住了两个概念的差别。但也有作者没能区分外交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探讨的主题发生了偏离。赵穗生从国际关系的视角讲述东亚地区外交的演变,此外还用到了“战略三角外交”(diplomacy of the strategic triangle)和“缓和外交”(de-tente diplomacy)的概念,^①但这两个概念属于对外政策的范畴,是大国博弈过程中采用的一种政治态度或策略,与外交实践属于不同的范畴。

本书是研究全球化引发当代外交变化的重要尝试,对当代外交学的价值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外交作用不断增强、外交手段不断翻新、外交备受关注的时代,外交学研究已经具备了学科大发展的时代需求和客观条件。而本书的出版带来的示范效应和启迪意义,都是具有首创性的。

^① Pauline Kerr and Geoffrey Wiseman eds., *Diplomacy in a Globalizing World*, pp.41-46.